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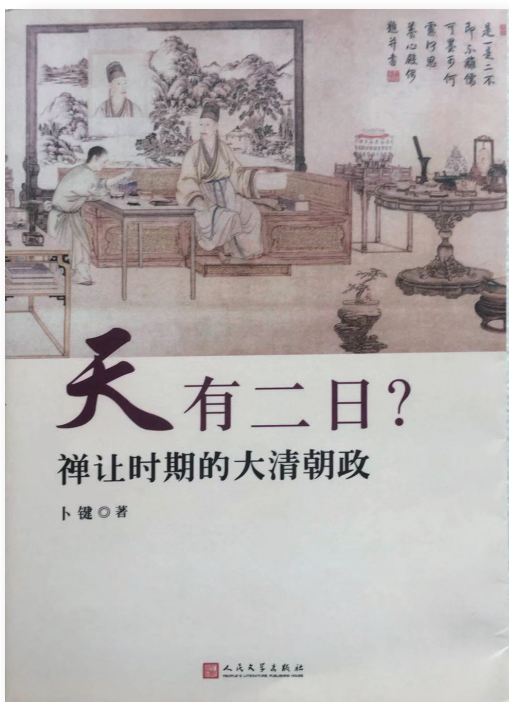
乾隆帝的传位盛举因何变了味道

——读卜键新著《天有二日：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 □潘凯雄

《礼记·坊记》中有这样工整的4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说的是封建王朝之普遍规律。然而在大清朝入关统治267年的历史上，却偏偏出现了一段三年零三天两个皇帝共存的历史：一个是已然手握朝纲超过60载的乾隆帝，史称太上皇帝、太上皇、上皇；一个是刚刚继位的嘉庆帝，史称嗣皇帝、子皇帝、嗣子皇帝。不仅朝廷有着两位皇上，就连历书也有了两个版本，全国通行本标着嘉庆元年或二年三年，紫禁城与圆明园等处仍用乾隆六十年、六十二年等年号。沿袭了数千年“天无二日”的铁律，在这1098天中竟然演变成了“天有二日”。

而后的历史进程表明：作为大清王朝惟一的这次禅让，恰恰成为了整个清代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个由盛而衰的拐点。其与这次禅让有无关联？是由于此时政治结构的复杂而引发，还是其他因素之使然？文史学者卜键在新作《天有二日：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中，对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从乾隆六十年秋宣布皇太子开始，对老年弘历精心设计的这次禅让娓娓道来，“在约五年的时间跨度中描摹宦情，军国大事，两朝帝王及一些枢阁大臣涵括其中，着力点仍在于禅让的三年”。期间涉及的人物众多，但主要还是弘历、颀琰及和坤三人：乾隆帝先是不断提到禅让，提前部署授受程序，如期禅让后又不搬离养心殿，“归政仍训政”，放权复揽权；嘉庆帝登基后有太上皇，下有权臣，能做到意志平和，深藏不露；和坤一仆二主，既要更周到地侍奉太上皇帝，又时时想着把新帝套牢……凡此种种错综复杂的纠缠，均在该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总体布局中，疏密有致、条分缕析、且史且文地一一呈现出来。

这也是一次乾隆帝念叨了60年的内禅，是他在即位之时许下的心愿。于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社稷，弘历期望用一种平和恰当的方式传承下去，以期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于个人修身，则是他熟读圣贤之书，遵循儒家理念，将治经与道统整合于一体的尝试。这样的脑子不能说不清醒，这样的愿望不能说不好。然而，清醒的头脑与美好的愿望和残酷的现实间却未必成正比，嘉庆元年的清朝，大的外患虽未袭来，但内乱却是此起彼伏，苗疆之变尚未完全平息，鄂川陕三省的白莲教又揭竿而起，东南沿海的海盗愈加横行无忌……史学上所谓“乾嘉盛世”也正是



在这个时期势彰显。

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反差何以形成？作为一部文史兼具的专著未必需要直面这样的追问，只要做到所谓尽量客观地直陈历史、还原真相，就不失为一部优秀作品。然而，作者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还原这段历史，而是在描摹历史上的纷纭世相时，暗藏着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沉思，而在我看来，这恰是《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最具价值的闪光点之所在，而更有趣的是：卜键笔下的这个闪光点，又是在看似不经意间落笔处闪烁发光。

《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从嘉庆元年正月初一（1796年2月9日）乾隆帝早起举行一年一度的“元旦开笔”入墨，在概括描述了所谓“元旦开笔”的来龙去脉，以及本次“元旦开笔”的内容后，作者笔锋一转，留下了如下文字：“此时，被史学家称为‘伟大时代’的18世纪正接近尾声，工业革命带给世界的巨变已然显现”。接下来，卜键一一罗列了法国、英国、俄罗斯和美国在这个节点上的状态，总结道：

此时距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还有约45年，欧美列强互相攻伐缠斗，尚无暇东顾，对清朝仍可称较好的战略机遇期。设若大清君臣变革图强、内外兼修，努力追赶西方列强的发展步伐，中国的历史、世界的近代史或将改写。令人遗憾的是，禅让时期的清廷，不管是上皇还是皇上，包括枢阁重臣，基本上缺少全球视野，缺少对西方世界的深刻了解，也缺少应有的紧迫感与危机感。暮气常是与牛气相伴生的。大清君臣动辄以“天朝”“天子”自居，不知或不愿正视世界格局的巨变，不知或不愿承认列强崛起与自身衰微，无视“天外有天”的事实。

如此描述看似直白且有些突兀，但恰是这一突兀构成了全书点睛的妙笔。其实乾隆时期又何止是“无视‘天外有天’的事实”，有时干脆就是直接与世界背道而驰。还是这位乾隆帝在禅让的前8年即公元1788年就完成了一件“逆天”之大事：这一年，乾隆帝曾三下诏书征集的《四库全书》终于编纂完成，看起来，这是一项庞大的文化积累传承工程，而实质上则更是一次严酷的文化禁锢。尽管最终收入全书的典籍多达3470种，但历时16年的编纂过程更是统治者以编书之名行禁书之实的一次文化屠杀，在这个过程中，被全毁的图书多达2453种，相当于《四库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三，被烧毁的有402种，相当于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而在被收入的3470种中还有不少已遭严重删改。而同样是在1788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始实行宪法，分国会为上下两院，专司立法，总统为最高行政首脑，一任4年，由公民选举产生；第二年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颁布人权宣言。

在这样的世界大势面前，“天无二日”也罢，“天有二日”又如何？其结果无非都是曾经的GDP雄居全球之冠的大清朝与滚滚向前的世界大潮渐行渐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于一国一社会而言，“天有×日”其实远不那么重要，致命的还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两者间关系如何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元素以及由这些元素所形成的一种结构关系。本书虽未正面直陈社会发展的这些基本规律，但却在对那三年零三天“天有二日”的历史惟妙惟肖之描摹中无声地呈现出了这一点，这既是本书的价值之所在，也为我们今日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鉴赏经典、品味好书，从一己角度出发，写下真实感受，这既体现了经典好书的丰富性，也充盈着读者个人的独特性。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典，经典给读者的影响与感染是因人而异的。《且行且歌》容纳了陈艳敏对心中文学经典集中且富有个性化的诠释。从中国古代的《楚辞》《诗经》《二十四诗品》《茶经》，到外国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兰波作品全集》《罗曼罗兰读书随笔》《劳伦斯散文》，陈艳敏娓娓道出心中所思、所想、所感。经典中的哪一个特质打动了她，她是如何被打动的，读者不难在她的随笔中找到清晰线索。这些经典著作犹如一束束光，照进陈艳敏的生命里。光照生命之后的感受与体验，则是一丝丝暖意，慰藉着在现实生活中毅然前行的她。

何为经典？答案可谓众说纷纭，其不变的核心词汇就是生命力。必得经过漫长时间淘洗之后依然在读者心中熠熠生辉的作品，方可称得上经典。我以为，是否也应该重视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读者的数量。经历过漫长时间考验的作品，必然是拥有众多读者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如果同时被许多清醒的读者所喜欢，是否也可算得上经典？即便算不上经典，是否可以认为它们已经具备成为经典的潜质？



如果拥有了一定的潜质，读者便没有漠视的理由。正襟危坐地拜读、品读、赏读，也便是题中之义。

作者品读陈建功散文集《默默且当歌》，念及其平日里对自己的关照，人与文、文与人常常在陈艳敏的文字里互相交错、重叠，可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陈艳敏看来，陈建功散文中对底层人士、市井民间的关照是最为可贵的。诚如她所评价的：“他怀着深挚的悲悯与大爱，怀着对生活深挚的热爱与眷恋，将生命注入了文字，将文字融入了生命。”钱理群在作者心中的地位无疑也是极高的。北大退休后，他毅然投入中学语文课堂中，给中学生讲鲁迅。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这是虽不能至然向往之的热切。虽年事已高住进养老院，但是他仍大力提倡赤子之心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现新的世界、新的美。唯其如此，才能抵挡住现实残酷带来的创伤。如此说来，《活着的理由》就是值得一读再读的。

阅读如果只是停留在读书这一层面上，书读得再多都只能是“两脚书橱”，读书所得只能用来炫耀。不止于读书，还谈心、读人，久而久之阅读才能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陈艳敏的阅读便是如此，她的读书随笔不是告知读者她收获了多少知识，而是告诉读者其心灵收获的诸多感动。

出行时诵读《乐府诗选》，让平凡假日多一些诗意。在陈艳敏的世界里，阅读既可以是单独言说的，也可以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为生活增添亮色、送来美好。诵读古诗只是美好之一而已，是肉眼可见耳朵可听的影响。她在读《伦敦的书店》后所写的随笔中认为杨小洲在她激动了许多情，她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不如此，何以会被杨小洲对书的痴迷所感染？不如此，何以会为杨小洲没能买回更多的书而感同身受？这是整本书中可贵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她和杨小洲一样都是真正的爱书人、痴书者。阅读

无疑是在茫茫书海中寻觅知音……

沈从文曾经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做过一次演讲，他说：“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为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跟通常所谓‘学问’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我以为，生命深度同人的情怀有关。在大千世界的纷扰之中，读书原也平常得很。然而，在包括陈艳敏在内的部分人的生命里，平平常常的读书是通往高贵精神之境的通道，舍此无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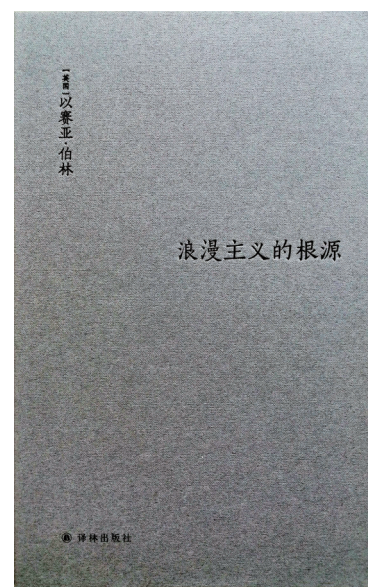
冯骥才的《感谢生活》让她看到困顿的生活也可以如此美好；《中国人的病》使她遇见散淡、温婉之外锋芒毕现的沈从文，那里有他为民的深刻忧思；穆涛的《散文观察》与其说是指点她如何从事散文创作，倒不如说是告诉她如何成为一个高境界的人；《汪曾祺书信集》中有一个活泼、幽默的汪老头儿，与散文中那个平和、淡泊的汪曾祺先生迥然有异。由此可知，经典或好书参与了她生命塑造的过程。

对陈艳敏来讲，好书是一束束光，既照亮了她的生活，更照进了她的生命。时至今日，她已有多册读书随笔集问世，那是她与一本本书遇见之后迸发出的火花。这些火花不是著作，不是成果，而是美好。或温和或炽热，或内涵不同或风格迥异，总能给爱书人带来新的启发与共鸣。《且行且歌》中评论的书籍，有我读过的如《诗经》《乐府诗选》《从热烈到温暖》等，我因之获得全新启发。那些我未曾读过的书及其随笔文章，则开辟了我在未来阅读生涯中新的场域。若有机会到陈艳敏的书店拜访，我会视之为一桩乐事。我想去看看那本她至今保留的朦胧诗集，翻翻那本薄薄的由周良沛整理的《古歌》，瞅瞅杨小洲送她的那一册《伦敦的书店》签名本。倘有余暇，再听她说道说道那些尚未写出的书里书外的故事，不也是一桩乐事吗？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浪漫主义的根源》，〔英〕以赛亚·伯林著，〔英〕亨利·哈代编，吕梁、张箭飞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出身俄国犹太家庭的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青年时期凭借对于卡尔·马克思的研究在学界崭露头角，之后转向观念史研究，并成为这一领域泰斗级的开拓者。本世纪初年，他的多种著作译入中国，在人文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也带动起了一股学术出版的热流。这本中文版的《浪漫主义的根源》，译笔出自武汉大学世界文学专业张箭飞教授和他的三位学生吕梁、洪丽娟和孙易之手，2008年曾列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的一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此次又重做校译再版，已归属于译林新版的《伯林文集》二十三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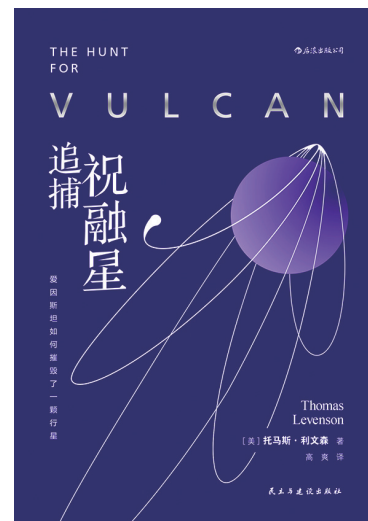
身为观念史学家的伯林，不仅学识渊博，思想通达，极具冲击力和穿透力，而且文笔生动，辩才无碍，既是学术著述方面的一流文学家，也是学术讲堂和文化传媒上的出色演讲家。《浪漫主义的根源》全书内容，即源自1965年三四月间伯林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所做的六场系列专题性质的脱稿演讲。依“编者前言”所述，为了呈现伯林思想表达的本色风貌，编者在根据BBC对演讲的现场录音做文稿整理时，尽量避免改动，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少量与录音不一致之处，多为伯林生前亲自做过的修改或补充。

虽然带着演讲实录的鲜明特色，《浪漫主义的根源》并非即兴即席的随意漫谈，书中基本观点和分析理路在伯林60余年的学思历程中，承前启后，衔接上下，具有稳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和价值依据。在现场讲座之外和之后，演讲录音于1965年6-7月经华盛顿特区教育广播电台首播，1966年8-9月和1967年10-11月又经BBC反复两次播出，直到1975年和1989年，澳大利亚的电台和BBC的节目还在完整或摘要重播。通过聆听录音接受伯林这6场演讲影响的社会大众，至少遍布3个英语国家，且持续存在了20多年。

书名“浪漫主义的根源”，就是这6场演讲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6场演讲的题目依次为“寻找一个定义”“对启蒙运动的首次攻击”“浪漫主义的真正父辈”“拘谨的浪漫主义者”“奔放的浪漫主义”“持久的影响”。面对历史文献和现实舆论中有关“浪漫主义”的纷繁歧见和众说不一的定义阐发，伯林绕开了从归纳概括的角度对浪漫主义再界定论的陷阱，转而深入到整个欧洲在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剧变潮流之中，探明了这一时期汇聚在浪漫主义名下的西方世界观念和生活观念的一股深广强劲的转折力量。它触及了近代西方文明传统中的理性主义和绝对可知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等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信念前提，矛头直指加剧这些信念的启蒙运动。

而17-18世纪由于内外交困而陷于落后的德国，则成为这一运动的起源地。哈曼、赫尔德、康德、席勒、费希特、歌德、谢林、施莱格纳、施蒂纳、尼采等几代人，在哲学、艺术等不同途径不同侧面上的开拓，贯穿起来，汇成激流，刷新了德国的社会思想，扩散、融合进了欧洲各国的艺术、道德、政治、法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认知与实践场景，整个西方世界的观念格局也因之一变。最终，在滋生出存在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极端化谬误的同时，这场浪漫主义运动也在另一个走向上，催生了强化了理性主义和深化自由主义的反转力，变得越来越强调宽容和体谅不完美的个体多样性。

《追捕祝融星》，〔美〕托马斯·利文森著，高爽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追捕祝融星》是一本内容严谨而富有文采的科普读物。它的作者托马斯·利文森，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研究生科学写作项目的主任和教授，常年勤于科普写作和科学史撰述。一般科普书和科学史著作，多以介绍成功的科学发现为主。《追捕祝融星》却反其道而行，讲述了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全世界天文学家在天体物理学集体迷误的一段历史。如书名副题“爱因斯坦如何摧毁了一颗行星”所示，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历史进程中的这段周折，最终是因为爱因斯坦的介入，才宣告结束的。而最初的开端，则与建立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基础上的经典天体力学，以及230多年间科学界对此深信不疑的普遍运用和普遍依赖直接相关。

书中把执著信奉牛顿理论的人称为“牛顿主义者”。促成“祝融星”亮相的勒威耶，算不上科学史上最耀眼的牛顿主义者。分别出现在全书第一、二章里的哈雷和拉普拉斯，留在科学史上的印迹都比勒威耶要闪亮得多。前者整理出版了牛顿的代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者改进了牛顿引力理论并写成巨著《天体力学》。但在这本并非为了给科学大师表功，而是为了给科学史上的负面人物记过的普及版科学史作品中，勒威耶才是当仁不让的书胆。他青少年时期数学成绩优秀，上大学却学了烟草工程专业，毕业后也一度从事烟草研究，后来申请到担任天文学教授拉普拉斯助手的工作，开始涉足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在对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这四颗距太阳较近的行星，展开有关微小引力扰动的重新计算过程中，他本已触探到了牛顿-拉普拉斯理论系统的某种缺陷。在寻求弥补这种缺陷的探索中，他曾反复尝试建立更复杂的方程，来准确把握水星轨道的各种引力扰动，却始终未能如意。之后，随着当时天文观测信息的一些新动态，勒威耶转向了处理天王星轨道的精确计算问题。出于校正计算偏差的想法，他提出了天王星外存在一颗未知行星的预设，并对其质量和位置做了估算。4个月后的勒威耶所预言的这颗行星，果然被柏林天文台观测到了，这就是海王星。

海王星的发现，使牛顿引力理论体系描述天体运动的效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也使促成这一发现的勒威耶，一跃而成为“那个时代第一流的天文学家”。大众媒体更把他誉为能执笔下的公式运算中召唤出行星的魔法师。勒威耶本人也欣然接受了这种赞誉，甚至还有点大言不惭地接受了他自己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海王星的意见。由此，他成为获得大量荣誉和国家资助的超级科学家。后来又担任巴黎天文台台长，长期领导法国天文机构。而他接下来计划进行的研究，不再是先前他曾为之苦恼过的如何克服经典天体力学缺陷的问题，反过来，变成了一个步骤固定的操作程序：在牛顿引力理论指引下，把全部天文观测数据都代入行星数学模型，然后，将所有的偏差归为下一颗“海王星”存在的征兆。

正是在这样一个试图让全部已知和未知的星座都乖乖归队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规划大力推行的过程中，1860年初，勒威耶以天文学权威的名义，宣布在水星与太阳之间存在一颗名为“祝融星(Vulcan)”的新行星。从初步天文观测报告的认定，到轨道形状和公转周期的运算，再到正式的命名，这颗新行星在勒威耶的加持下，提前办齐了横空出世和登记户口的各项手续。需要补充的，只是对它未来应该抵达的运行位置，再度给予观测验证。一场捕捉“祝融星”踪迹的天文观测大竞赛，从此在全球各地兴起。但是，直到1877年66岁的勒威耶去世，这场竞赛都没有产生足够可信和可靠的优胜记录。1878年，最后一次经媒体广泛报道的观测“祝融星”行动，在美国怀俄明州了之之地仓促收场。

1915年11月，爱因斯坦将自己收集的水星观测数据，代入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方程，运算得出了与水星在近日点的进动偏差一致的结果，从而表明无法显示和解释这种进动偏差，只是以往一贯使用的牛顿力学理论的计算方式本身不足所致。为弥补这种不足而设想出来的“祝融星”，随之化为幻影。